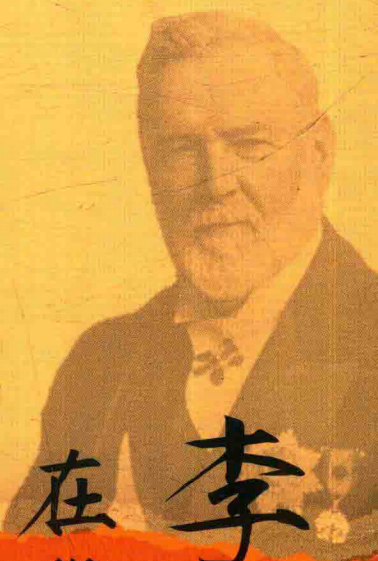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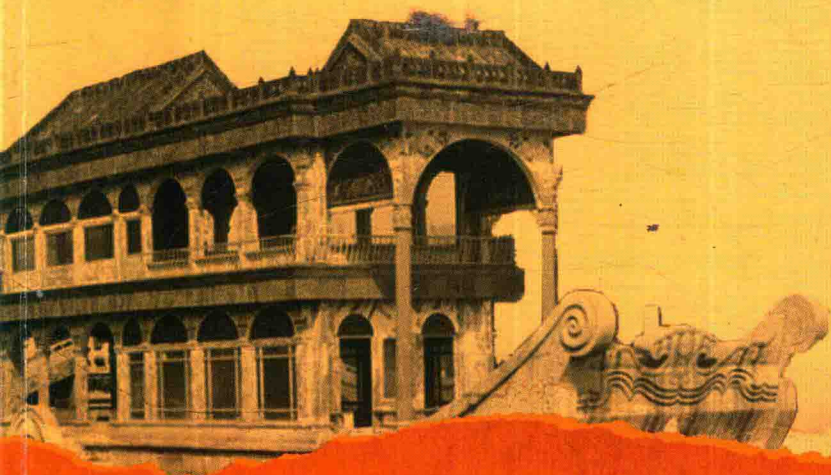


从精神救赎到肉体救赎，再到精神救赎，一个英国传教士的晚清轨迹。



李提摩太 在华回忆录

〔英〕李提摩太 著
陈义海 译

親歷
中國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ARTS PUBLISHING

李提摩太 在华回忆录

〔英〕李提摩太 著

陈义海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 (英) 李提摩太 (Richard, T.)
著; 陈义海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8.1
(“亲历中国”系列)
ISBN 978-7-5399-6894-0

I. ①李… II. ①李… ②陈… III. ①李提摩太
(1845~1919) — 回忆录②中国历史 — 史料 — 清后期
IV. ①B979.956.1②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3982 号

书 名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著 者 (英) 李提摩太

译 者 陈义海

责任编辑 郝 鹏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94-0

定 价 3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东行使徒的一生

陶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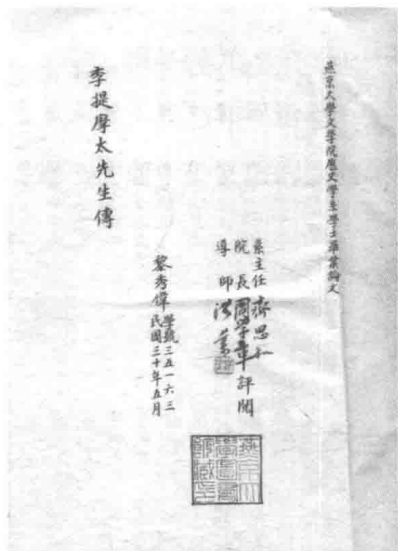
1871年夏天，大清国东北的某处旷野，有两个响马（土匪）劫下了一辆马车。他们甩着马刀吆喝着，让车里的人滚出来。很快，有一个高大的欧洲青年从马车里走出来。两个土匪从未见过西方人，他们被吓傻了，以为大白天遇上了鬼。他们立刻骑马走人。但不久，他们又带着一股人马杀来了——他们太好奇了，想回来看个究竟。

那个欧洲青年驾着马车并未走远。土匪们很快包围住他。好在土匪头子见多识广，还知道这世界上有“洋人”存在。他大胆上前，挥刀问那个欧洲青年，说：“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生意的呢？”那个人用生硬的中国话来回答：“我从英国来，是来卖书的。”那个头目便又问：“卖的什么书？”那个欧洲青年便说：“是劝人行善的书。”他边说边搬出了一摞《圣经》，热情洋溢地说：“如果你们诚信向善。我分文不取也可以，送给你们。”他微笑着把书送给土匪头目，但是土匪头目连忙摇头，说自己不认字。出于对知识人原始的敬畏，土匪们放过了这个要送自己书的洋人。



李提摩太侧面像

这个力图把《圣经》推销给土匪的人，就是本书的作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深怀对古老中国的向往，年轻神学士李提摩太来到了中国。在来中国的



民国时代所著的李提摩太传

轮船上，他学了二百一十四个汉字部首，开始了用大半生来成就的中国之旅。

在李提摩太到中国不久久的 1876 年到 1878 年间，中国北方滴雨未下，干旱带来了严重的饥荒。这就是晚清历史上凄惨无比的“丁戊奇荒”。饥荒蔓延，很多人开始吃树叶，也有人开始吃死人，而积贫积弱的满清政府却无计可施。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开始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撰文，呼吁口岸及本土的外国慈善团体赈灾捐款。很快，李提摩太就筹集到大量的救灾款。

在蜂拥的救荒潮中，李提摩太记下一段非常引人深思的故事：“为了避免人员踩踏伤亡，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灾民被迫排成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一个不易除掉的标记，可惜仍然有些人洗掉了标记，重新排到队尾。”李提摩太说，“但那双干净的手出卖了他们，我们只向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救济。”

1877 年，山西的灾情严重超过了山东，受上海教会赈灾委员会委托，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灾。在途中，他见到了最惨绝人寰的景象，到处是死尸，倒在路边任野狗撕扯。这令他大为哀恸，开始在英国筹集善款赈灾。他共筹得六万英镑，这些钱兑换成白银后，由李鸿章派兵押往山西。途中，他听到押送白银的士兵间的谈话，他们嘲笑这些钱是傻洋鬼子的，便深感到，拯救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拯救他们的肉体一样重要。

人到中年以后，随着社会阅历的积累，李提摩太吸取了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经验。特别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更专注于跟当时中国的高层统治者打交道。通过影响诸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岑春煊、周馥这些高官，乃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来实现对中国的改变。

李提摩太开始融入中国，穿着中装，吃着中国菜，并尽量缩减个人的开支，购买更多的先进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投影仪、手动发电机……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国人的灵魂。他开始在各地的官绅中进行讲

演,努力让中国有知识的人对西方的科学感兴趣,以便启蒙他们,让他们为中国同胞谋利,免受贫困的压迫。同时,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影响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全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担任着中国维新变法的幕后总策划。我们后来所知维新变法的若干纲领性建议,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这些建议在1905年及以后的光阴中,逐一变成了中国的现实。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支持义和团的山西巡抚毓贤,蛮横地烧死了四十多名外国人,其中甚至有妇女和孩子。历史风暴过后,晚清史上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产生。而山西的这桩惨案,各国全权委托李提摩太出面与李鸿章商议处理这件事。李鸿章主张赔款了事,李提摩太提出了一生中最亮丽的建议:“传教士的生命不能拿金钱来计算,而罪行又必须得到惩罚,那我们就来建一个学校,用教育来惩罚迷信和无知。”

他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让山西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这便是现代山西大学的前身。正是凭借这所大学带来先进文明,山西得以在民国时建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模范省。而李提摩太处理这一事件的胸怀,又给各国树立了榜样。不久,美国政府在传教士明恩溥的主持下退还了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等。

1915年,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四年了。正值李提摩太七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创办了清华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给他写了一封信,盛赞他的一生:“你的许多朋友今天都在感谢主,感谢他把你的心带到了中国,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将各种潜在的、未知的力量释放出来。为了中华民族的改变,以此来实现世界的改变。这种努力如海上行舟,如雄鹰翱翔,你的努力为后人打下了基础。”

1916年,李提摩太离开中国回英国养病。在他的家乡,忙于战争的人们,没人知晓这位老教士一生的故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平息了下来。深感于欧洲已陷入堕落的李提摩太,买好了船票,准备和妻子一起返回中国,并决心就此终老于中国。可惜未能成行,他便因为老病在故乡安静地与世长辞了。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位影响中国至深,却一直为西方和中国都忽略了传教士自述平常的一生。当我们跟随着李提摩太的叙述进入那段历史,进入晚清风云流转的四十五年光阴,我们会收获无尽的启迪、感动、沉思与反省。

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的联想,乃至完全颠覆我们对历史的成见。但这其中,首先能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因为信仰、怜悯、热爱、宽容与无畏,与一个古老帝国共度夕阳之垂。感谢博学的陈义海教授辛勤的工作,他为这部回忆录所做出的严谨工作和所有付出,让我们充分体味到这位东行使徒的真诚而热爱的一生,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的一生。

原 序

正如我在四十五年前在中国所发现的那样，摆在来华传教士面前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灵魂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挽救他们的肉体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以每年四百万的速度在消亡。同时，还必须解放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比他们的女人的裹脚还要扭曲；还必须将他们从一种哲学和习俗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们已经影响了许多个世纪，并使这个民族可能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然而，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可怕的习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接受教育——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的光芒的照耀，它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幸哉，传教士们给这个民族的政治界、宗教界的领袖所带来的正是这种福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经年的犹豫和怀疑之后，最终相信了我主的福音，可是，大多数人由于太无知、偏见太深，终无行动。这样，文明古国中的一个，或者说，现代社会最伟大的民族当中的一员，便陷入革命与无政府状态的泥潭，而它要摆脱这种状态需要很长时间。

本回忆录是一系列值得赞许的努力的告白，这些努力是要引领中国的精神领袖们走向上帝的国度，引领他们通向一种应许：现世福祉百倍，来世生命永享。这些努力意味着不拘一格地提升和欧洲一样大小的整个中国，其途径是：推行更好的宗教、更好的科学、更好的交通、更好的国际贸易，建立现代学校和学院制度，创办现代出版业，创建新型的工业与制造业。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有一臂之力，这从我的这些回忆中可以见到。

对于那些为拙著提供过帮助的各界人士，我深表谢忱——

感谢我的女儿艾琳娜(Eleanor)，感谢她记录我的口授，并将文稿整理成出版格式；感谢希尔达·C.波塞尔小姐，感谢她不辞辛苦地收集本书照片，并

为整个文稿打字;最后,要感谢浸理会总部的秘书 W. Y. 弗勒顿牧师,是在他的要求下我才写出这部回忆录,还要感谢他帮我修订整个书稿。

李提摩太

1916 年 1 月于上海

目 录

序言 东行使徒的一生	001
原序	001
第一章 早年生活	001
第二章 在中国的最初几年	006
第三章 定居青州府	035
第四章 山东赈灾	047
第五章 山西赈灾	067
第六章 在官员和学者间的事工(1881—1884)	090
第七章 第一次休假(1885—1886)	117
第八章 艰难忧患的一些年月(1886—1891)	123
第九章 在上海广学会的事工(1891—1894)	136
第十章 中日战争期间的见闻	145
第十一章 代表教会进京上书	155
第十二章 中国的改革运动(1895—1898)	163
第十三章 天台山纪行	177
第十四章 二度休假(1896—1897)	189
第十五章 义和团运动	195
第十六章 创立山西大学	200
第十七章 变革中的中国	209
第十八章 宗教复兴运动	220

第十九章 大乘佛学	226
第二十章 晚年时光	237
第二十一章 我与和平运动	249
译后记 沟通中外文化的宗教使者	257

第一章 早年生活

1. 我的童年

1845年，我出生在一个名叫福尔迪布莱宁的小村庄。这个村庄位于威尔士的凯尔马尔森郡，它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的山谷”。我的父亲提摩太·理查德起初是位铁匠——与我祖父一样，不过后来开始掌管农场。

我的父亲被誉为整个地区最风趣的人之一。他是伯特利与撒冷两地浸礼会的执事及秘书，经常充当敌对政党间的和平使者。我的外公是一名雷特尔克村的农民，也是拉尼比特尔附近亚伯度阿尔村的浸礼会执事。至于我的母亲埃莉诺·雷特尔克



李提摩太头像

(Eleanor Llethercoch)，著名的威尔士牧师吉尔斯比·琼斯曾这样写道：“在‘威尔士值得称道的人’中，他再未见过谁像她那般为人诚实性格温和，而且她的煎薄饼手艺也是无人匹敌的。常回想起当有人冤枉她或说她坏话时，她只说：‘好吧，这么做对他们的坏处比对我的更大。’”

1858到1860年间，复兴运动如燎原之火般席卷了美国、北爱尔兰、苏格兰、挪威和瑞典。在这次运动中，即便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缴械投降，皈依了基督教。一些人宣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在我家附近的一条河里受洗，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久之后，在一次并非特别涉及传教的讲道中，我第一次有了献身传教工

作的念头。那次讲道的经文我记得很清楚：“服从胜过祭献。”^①从撒冷堂回家的路上，我告诉比我年长四岁的哥哥约书亚，在整个讲道过程中，似乎有个声音命令我去外国传教。他听了有点惊讶，因为他心中从未有过这种念头。

2. 求 学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公理会办的，就建在属于我父亲农场坦耶斯盖尔的一块地里。我在这里一直读书到十四岁。我十五岁时，父亲希望我能来农场帮助哥哥约书亚，但母亲和几个哥哥却认为我应该继续学业。我告诉父亲，只要再支持我读一年书，以后就不用帮助了。于是他把我送到约二十英里开外，一个叫做十字客栈(Cross Inn)的地方，在一所由一个表兄开办的学校就读。除去日常课程，我还要和小学教师一起参与额外的课程，并且学习首调唱名法等音乐知识。年末，校长收到来自潘尼格罗斯(Penygroes)的学校需要教师的申请，他便派遣我去了。

这所学校在矿地上，我不仅白天要教小孩子，晚上还要给矿工们开夜校，有些矿工的年纪足以当我父亲了。有了上课挣的钱，我能够为自己支付一所在拉尼比特尔的语法学校的学费。语法学校的校长一有事外出，就会让我来管理学生。学校附近的人们常说他们总能知道是谁在上课，因为孩子们在我上课时要守规矩得多，也安静得多。一想起这点，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取得一些谅解。

往南几英里有个叫新客栈(New Inn)的地方，那里的校长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关闭了学校，去他处谋职。于是我被派遣立马前往新客栈担任临时校长。当天下午，那里的孩子们也被告知学校第二天早上会照常开放，只不过换了一位新老师。离开新客栈时，我已有经济能力支持自己进入一所天鹅海(Swansea)的师范学校。

我没在师范学校待太久，因为家中农场的哥哥约书亚打算冬天去学校上学，便要我到农场代替他干农活。我熟悉各种农活，无论是耕地、割草、挖渠道，还是修剪篱笆、盖稻草堆。看到我返回农场，邻居们都说我读了那么多书，到头来还是只得回来干农活，真可惜呀！

^① 此语出自《旧约·撒母耳记上》15:22。

3. 教 学

然而有一天,我最年长的哥哥大卫给我带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则康维尔艾乐维特(Conwil Elvet)资助学校招聘校长的广告。而哥哥约书亚愿意回农场干活,如果我得到这个职位的话。递交应聘申请后,我得到一封回信说有六十个人在我之前申请了。又过了一星期,我收到第二封信,通知说六十个人中只有两名合格的申请者,即当地浸礼会牧师的儿子和我。几天后我收到应聘成功的通知。我并不认识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我非常惊喜。可是我到那儿时才知道当地一名堂会理事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而他的儿子和我



李提摩太青年时期像

在天鹅海是同班同学。牧师的儿子没能获得职位在当地引起极大反感,许多父母接走了自己的小孩。因此我开始教书时,只有二十一个小学生。不过十八个月后,三所乡村小学因招收不到学生被迫关闭,而我却有一百二十个学生了。

我给高年级的学生组织开办了《圣经》研读班,每星期花一个晚上为他们讲解保罗的生平。他们非常喜欢以至于请求每晚都上这门课。我没有答应,不过研读班还是经常上课的。我离开那里不到一年时,每个听课的人都加入了教会。

4. 在西哈维津神学院的经历

接下来我成为潘布洛克郡西哈维津(Haverfordwest)神学院的学生。有个亲爱的同学叫西维斯(Chivers),考试成绩公布时,他的名字和我的总是靠在一起。神学院一毕业我们便彼此分别,后来的近三十年里各自忙着发展自己的工作直到1897年才偶然相见。当时我正在返回中国的路上,途径伦敦时听闻一个浸礼会的互助会在一所教堂举行会议。作为一名完全的陌生人,我去了那里听取工作报告。

会议开幕后,主持人说道:“很高兴看见西维斯博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

都乐意知道他在芝加哥的工作进展。”主持人话毕，一位正好坐在我前方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向我们说了他正通过办一份期刊来努力使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年轻人联合为一个浸礼会肢体，以改变一个国家里两个独立的浸礼会的局面。

等他回到座位，我的手放到他肩上并问道：“你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经过打量，他认出了我，便马上起立对主席说现场有一位他在威尔士时的亲密同学，已在中国传教近三十年，他相信大会成员会乐意听我说一番话。于是我走到讲台，向听众简短叙述两个来自威尔士偏僻小地方的同学受到上帝大能的召唤从而领导传教工作——西维斯博士影响着美利坚合众国浸礼会的年轻人，而我在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众学生中做工。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同时也领悟到不要轻视渺小的事物，因为如果上帝愿意，从中也能生出伟大的结果。

5. 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教

1866年兴起了一场向中国传教的运动，这注定在传教工作上起着深远影响。这是传教运动向中国内地的首次起航。那时戴德生(Hudson Taylor)先生发表的一些文章被称作《不定期报》，他在其中阐释了他的传教原则——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相信上帝会用特殊带领来回应我们的祈祷，而非通过出发传教前的特殊学习；乐意到内地传教；着当地服装；住当地房屋；吃当地食物；并做好一生奉献自我的准备，而非一生在口岸享乐，尽管一些别的传教士会沉溺于此。

这一传教运动在浸礼会传教会中引起极大反响，以至于1868年，我听到金尼斯夫人(Mrs. Grattan Guinness)为中国内地传教事业的声援时，被这一极具英雄气概和自我奉献精神的计划吸引了。

那时正值我将从西哈维津神学院毕业之际，我决定加入他们。不过因为我属于浸礼会，他们便推荐我向浸礼会传教会提出申请。我提出了申请，并渴望被派至中国北方。当浸礼会传教会委员会询问我为什么想去中国北方时，我回答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中国人皈依后可以将福音传到较为落后的国家。欧洲人在北方地区传教，也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并且中国北方人成为基督徒后，能使整个帝国的国人皈依。

起航前的最后一刻，他们又问我能否保证十年内不结婚。这个问题让我

很惊讶,因为我还没考虑过太多结婚的问题,只是觉得带着妻子进入内地是危险的,因为当时中国内地就像非洲野外一样鲜有人知悉。于是我答道我是在十天内还是十年内结婚都由是否利于传教工作而定。结果我是九年后结婚的。

1869年春,浸礼会传教会接受了我
去中国传教的申请。潘布洛克郡一个我常去讲道的教堂里有个人名叫瑞斯(Rees),他总是载着我回到离教堂十五英里远的西哈维津。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我的好友,听到我要去中国传教很受感动。我们的友谊如此真挚,他们只要有钱就会和我分用。我们在无声的泪水中告别。



来华传教的教士一家三口

第二章 在中国的最初几年

1. 在英格兰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将乘坐“霍尔兹蓝烟筒”航运公司的“阿基里斯”号启程。就在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了。不过由于它深度不足以让大吨位的船只通过,我们只得绕过好望角航行。行至毛里求斯时,船长惊讶地发现由于一场地震,上次经过还是港口深水区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小岛。人们曾一度认为毛里求斯是世界上最碍欧洲军队健康的地方,因为当地的死亡率极其的高。然而我们到了那里却听说条件已经完全改变,死亡率也很低了。调查变化的起因时,我们发现以前的兵营建在低地上,而重建的选址在一座山顶。在这里士兵们就可以远离导致他们伤亡的疟疾——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潮湿地方的蚊子滋生的。

2. 抵达中国

在香港时,后来成为主教的慕稼谷牧师(Rev. George Moule)登上船,他从英格兰度过首次休假刚回来,便和我们一起去看上海。他为欢迎我来中国而表示出无与伦比的友善。我对他说有人建议我路上不要尝试学习中文,因为不同地方的发音差别太大,并询问他对这一建议的看法。他对此完全赞同,不过补充说我可以学习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二百一十二个部首,它们是解开组成书面中文的象形谜团之关键。到达上海前,慕先生给我进行了部首测试。

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Mr. Thomas)从前属于伦敦传教会,后成为新天安堂(Union Church)的牧师。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我,并坚持让我搬到他家。我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4日前往芝罘(今烟台)。2月